

太平天国史论

太平天国史论解读

容闳评述太平天国

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大学毕业的学者容闳（1828—1912），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从一个奋发有为的外国留学生起便饱含忧国忧民之心。学成归国后，投入救国救民的行列，制定建国方案。勇流激进，曾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时寄托了殷切期望，因事不成，便转而跻身于清朝洋务运动，大办外国留学事务，之后又投入同封建主义斗争的维新运动，失败后隐居美国。病盲之际仍望洋忧华夏，最终落得魂落异乡。容闳做为一个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进行救国救民的先进中国人，而他与太平天国的一段有益接触，揭开了他个人历史的新篇章。他的爱国的一生，他的致力于祖国富强之美好愿望，说明他是个值得人民怀念的人。



容闳像

留学美国前后

容闳字纯甫，1828年11月生于澳门附近的彼特罗岛南屏镇。家境贫寒，容闳居三，七岁入塾，鸦片战争后做糖果小贩，十二岁短时间务农，后经人介绍在澳门当印刷工人，1841年入美国人勃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办的小学，1842年全家迁香港。1846年做为第一个报名者随勃郎赴美国接受完全教育，因家贫得美国人资助在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相当于高中）。1850年考取耶鲁大学。曾学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由于认真攻读曾两次获英文论文一等奖，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他的汉语程度较差，回国后曾认真补习。在美攻读期间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1854年做为仅有的中国留学生在耶鲁大学

毕业获学士学位，时年二十六岁。

容闳在美国读书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而马萨诸塞州又是北方工业中心。对比中美两国，他曾激昂地揭露清朝腐败，抨击帝国主义对祖国的蹂躏，以致“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抑”，他发誓要以自己“生平所学，见诸实用”，将所见所闻“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实验之境”，颇具民族自尊心和救国抱负，因此容闳不愿留在美国，不接受美国宗教界的要求充当一名传教士，终于在1854年11月，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一年余，历时154天乘船抵香港回国。

1855年住于广州，此时他已知太平天国起义之事，但他并不理解太平天国，反认为是“不正当”之举动。当他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的“残暴”，他在“愤懑之极，乃对太平天国之举动视为正当……表同情，”甚至一时冲动“几欲起而为之响应”，这是容闳对太平天国革命同情支持的萌芽，它奠定了他以后要访问天京的思想基础。

1856年5月，容闳以精通英语到香港当时实际上的美国驻华代公使派克医学博士处任书记，后辞职任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就在这时容闳认识了洪仁玕。做为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之一的洪仁玕，因为未赶得及参加金田起义，以后便到香港随外国人学习西方知识——天文、地理、历数、医学等。洪仁玕还任香港英国伦敦传道会职员和中国牧师共四年。容闳与洪仁玕在香港有了第一次友好的接触，双方在交谈中洪仁玕告诉容闳自己与太平天国和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关系，尤其是倾吐了要去天京的决心，容闳当时是了解此情的，二人在香港又交谈了些什么，已无从查考，但知最后洪仁玕以主人身份邀约容闳以后去天京再相见，事实上颇有愿在天京与容闳共事的意思。这次交谈促使容闳对太平天国产生好感，而“天京”在容闳心中燃起一团异彩。

1856年8月，已是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前夕，容闳觉得要有更大作为非去内地不可，于是离港赴沪，先在上海海关任翻译，这时有着一颗纯洁心灵的年轻的容闳，因为看不惯海关中一些职员“狼狈为奸，以图中饱”的丑行，加上看到海关总税务司又为英国人所把持，中国人与外国人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觉得大大有损民族自尊心，愤而辞职，容闳亲历上海这个外国冒险家的乐园，由于自己并目睹同胞在租界内受凌辱，曾猛击一个苏格兰人，这是对“治外法权”的蔑视。加上当时黄河决口流离失所的农民拥进上海，构成了一幅鲜明的悲惨图景，它深深地刺激了这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做为一个中国人除了卖国贼以外的任何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罪恶阴谋，容闳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偏爱，容闳却认为瓜分中国的阴谋其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美国政府出现干涉的缘故，这当然是一种有害的糊涂认识。

容闳后又去由外国人创办的“宝顺洋行”任职，1859年3月被派往产茶区

调查，先由沪出发乘船经杭州、衢州、肖山、玉山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湘潭、华容、旋经湖北汉口、九江、湖口、杭州，历七个月满装茶叶于9月30日返回上海。在这一段时期，容闳出入了不少太平天国占领区，虽没有与当地驻军将领有过直接接触，但是沿途所见，颇有感慨则是很自然的事了。

天京访友献策

1860年11月初，两个美国传教士，一个叫曾兰生的中国人欲作天京游，他们邀约容闳同行，本来对太平天国怀有一定好感，但又疑团重重，例如太平天国领袖的抱负和志趣怎样？有没有能力推反清王朝建立一个新政府？旧友洪仁玕近况如何？自己有一个建国施政七点计划能不能被接受？等等，容闳觉得必须拨开迷雾亲自访问做出结论，因此欣然答应同赴天京。

11月9日，容闳一行由上海乘船抵苏州，受到太平天国忠逢朝将刘肇钧的欢迎，这是容闳进入太平天国领地第一站见到的第一位领导人，刘肇钧为他开具了介绍信命往丹阳，并介绍认识四个在苏州的美国医士、商人，英国副将和一个法国人，并以“鸡羊等物相馈”。11日抵无锡，12日抵常州，13日抵丹阳。沿途所见“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他感到太平军与人民：“相处甚得”，而丹阳主将“为人和蔼可亲，礼貌周至”，给他留下良好印象，丹阳太平军主将与他谈了许多情况，都有助于他对太平天国的了解。

11月18日，容闳抵天京，当时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他终于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还当容闳抵天京前，早有信息传到天京，时在天京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派人迎候于中华门外，容闳入城后下榻罗孝全处。1859年来到天京的干王洪仁玕即于次日热情接见他。由于洪仁玕的预言和邀约实现了，因此这次是继五年前在香港交谈的再次会晤，显得格外亲切友好。当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自然成了他们话题的中心了。洪仁玕首先问容闳对于太平军之观念若何？是否赞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旨？是否愿意参加太平天国？特别是后者，本无诚意的容闳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他来到天京是来探视故友而已。干王对此甚为惋惜，又重复了邀约之意。容闳回答“实无他目的”，希望来天京多了解实际情况，有助于消除传闻中的怀疑攻击，就心满意足了。洪仁玕感到失望，容闳亦觉过意不去，遂又说：惟此次自苏州到南京，旅途所见，颇有感触，愿向天国贡献七点计划：1.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 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 建设海军学校；4. 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 创立银行制度及订度量衡标准；6.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是容闳抄袭所见之西方建国蓝图以振兴中华

的一个方案，容闳向洪仁玕表示如能采纳他的七点建议，他愿为天国效劳，这个态度是诚恳的。

容闳的建议迅速转到洪仁玕手中，洪仁玕详加阅读，越二日，洪仁玕复邀容闳做第二次会晤，洪仁玕就七点计划逐条发表意见，认为极其重要，指出某一条最佳，认为某一条最重要，侃侃而谈，“殊中肯”，容闳满心欢喜，他乡逢知音，志同道又合，因为他知道干王久居沪港“见闻稍广”、“较各王略悉外情”，了解欧洲各大国富强的原因，容闳对第二次会晤寄予很大希望，但出乎预料，洪仁玕回答他有职无权，况且诸将领皆统兵在外，必须待各路将领回京协商经多数赞成始可实行。容闳听了大失所望，干王所说只是根据太平天国内部条件看待，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干王没有能力从根本上看到当时处于军事倥偬之际，那来建设基地？其次根本缺乏物质基础和经济能力，第三也没有这方面的科技人才。不用说有一个洪仁玕，即使有十个容闳在天京也无济于事，实际上洪仁玕在接见容闳的前一年，自己即已写出《资政新篇》，他企图采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造火车、轮船、兴银行、创医院、办学校、开矿藏等。《资政新篇》诞生于容闳的七点计划之前，而且《资政新篇》中的主张其完整性，远见程度都在容闳的七点计划之上，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复兴中华并无二致；但在目标上两者显然不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为了建设农民阶级自己的“新人新天新世界”，而容闳的七点计划说是为了帮助建设一个美好的现代水平的太平天国农民阶级的政权国家，显然缺乏明确目的。

洪仁玕对自己在《资政新篇》中的众多设想能不能实现。无资料证明有实现的任何准备和信心，尽管容闳在七点计划中主张采用美国武备、海军、实业学校、农业、商业、水产、工业、蚕桑、茶叶等，聘请政府顾问等建议则是洪仁玕所未能想到的。但《资政新篇》不能实现，容闳的七点计划同样也不能实现，则是时代的局限和超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致，这点洪仁玕、容闳是无法理解的，但容闳的七点计划虽不完备也缺乏具体措施和组织保证，但这的积极意义是不应该低估的，就同《资政新篇》不因为它的空想性而忽视一样，这样会谈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也未获良好结果，但它反映了一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救国救民的先进中国人之间的一次有益探讨，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祖国复兴史册中谱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容闳的计划未被采纳，但干王对旧友怀念挽留之情从未减退。数日后，干王遣使赠送一颗官印，封容闳为一等官爵——义爵，意在挽留。这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封赏官爵尚未泛滥之际实属隆遇，容闳对此感激，但容闳不相信太平天国取得真正胜利，便亲至干王府“面谢其特别之知遇”。容闳念念不忘其七点计划，他告诉干王无论何时只要实行他的七点计划，招之即来。但不接受封赏，希望得一护照能自由往来于太平天国境内即可，干王知不可强留，满足了他的要

求，容闳在天京畅游一个多月后，作为一个匆匆过客于12月24日悄然离去。

天国是非评说

容闳从1860年19月9日抵苏州到12月24日久别天京，在太平天国领地一个多月。沿途耳闻目睹和天国领导人的交谈，加上去浙、赣、湘、鄂历时七个月的采购茶叶之行，他对太平天国的观感很深，议论颇多，既说了好话也说了坏话，对此大有探讨之必要。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性质和作用，容闳认为太平军起因“并非是英雄豪杰之所为，其革命魄力至伟，能自僻远之广西过湖南、江西、安徽等省，旌旗所至，无坚不摧”。最后“蔓延东南而达精华荟萃之金陵，历时15年之久”，在15年中“清政府几无日不处于飘摇风雨之中”，这个评价是客观的正确的。但容闳把这一伟大胜利归功于“惟宗教之故”，而太平天国政权也“含有宗教性质”，他又把洪秀全一生纳入“宗教经验之起点，宗教经验之结果”，这是明显地对事实的曲解。但是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起因的“真因其恶根实种于满洲之政治，最大之真因行政机关之腐败”。此说虽不全面但已触及本质。又说“既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这个看法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之后做出的结论。确实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的认识水平。

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究竟有没有？意义有多大？这在容闳思想上是有结论的。关于太平军的良好军纪，容闳引他从苏州到天京旅途所见说：“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掠者，活以极严之军法”。容闳未见过太平天国后期领袖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但从谈吐中了解到他们“皆极聪颖”，表示钦佩！而对李秀成在苏州“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颁以爵位”，更有好评。对于无锡地方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惊众，”表示赞赏。关于太平天国的伟大历史作用，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可称之为良好之结果者，唯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想思”，他列举了以后1894、1895年的甲午之战，1898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1900、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1905年孙中山同盟会成立诸年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传大推动作用的评价是可取的。

容闳指出太平天国在1860年忠王李秀成率军攻克苏州、杭州广大富饶地区后，开疆裕土、财富充斥，容闳断言因为“财产富多美色”以致造成了后期太平军道德之每况愈下，“足以消磨其雄心壮志，而促其灭亡”，这个评说是客观

的无可非议的。

容闳与罗孝全等所有西方传教士一样，要人们对太平天国崇奉的被改造的“上帝”不要感情用事，对于太平天国不要“过于信任”云云。更有甚者，容闳对太平天国不是采取虚无主义就是一笔抹杀。太平天国失败后，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只不过是“一时之狂热”，“虽经十五年乃不久而雾散烟消，于历史上曾未留一足为纪念之盛迹，在南京占据十年之久，亦不见留有若何之耶苏事迹，”他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太平天国在中国政治上绝无革新之影响”。又说“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这种资产阶级偏见使他终于投入太平天国对立面。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1863年5月，容闳投奔到在安庆的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帐下。曾国藩欢迎他支持他，容闳大有相见恨晚之叹，因此后来他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捧为“中国之军事家政治家”，同时又不惜笔墨为“湘军”镇压西征军而叫好，为曾国藩“克复南京，平定大乱”、“渐平捻匪”而欢呼。甚至为“太平军之乱完全肃清后，人民乃稍稍得喘息，中国之得享太平与清政府之未被推翻，皆曾文正公一人之力”而庆幸，容闳为清王朝的苟延不死而高兴，为曾国藩屠杀天国军民大唱赞歌，彻底暴露了容闳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从事洋务活动

容闳投靠曾国藩后，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曾国藩两次接见了，命他赴美国采办机器，决定开设西式机器厂，这就是后来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是为“洋务运动”的先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曾国藩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维护风雨飘摇中封建王朝统治，巩固他们自己的实力地位，开始重视采购外国机器。作为一个来自贫寒家庭的知识分子容闳也积极主张采购外国先进机器，这显然是与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之流要采购机器的时最终目的那是有区别的，容闳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尽管最终摆脱不了修补封建王朝的藩篱的目的，但对此仍应持基本肯定态度，而曾国藩重用容闳也没有理由持反对态度。

1863年10月，容闳携银六万八千两，由上海出发经新加坡，锡兰、埃及、法国、英国抵美国，在美半年后穿巴拿马海峡，过太平洋，经檀香山，1866年春返回上海，采购机器成功，时曾国藩坐镇江苏徐州镇压捻军，容闳赴徐州报功，曾国藩大喜，上报清廷奏封容闳为清五品候补同知衔，容闳感激涕零，遂跃入曾国藩的幕僚之中。

1870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容闳任中方谈划代表的译员。谈判结束后，容闳

向曾国藩提出留学教育之事。关于留学教育在当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和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和熟悉西方生活方式的奴才走卒是愿意吸收留学生，发展留学教育的，容闳本人毕业前夕就曾被动员充当上帝的奴仆——传教士而容闳只是拒绝罢了。现在容闳提倡选派留学生，那是和外国侵略者的目的截然不同的；他是出于选拔造就人才。“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曾国藩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大力支持留学教育。这并不是坏事。因此谈判结束后容闳被指定主持“留学事务所”，积极选送留学生。1871年，曾国藩在南京逝世，容闳很悲恸。接着投入曾国藩门徒李鸿章名下。1872年夏，容闳率第一批三十名留学生，第三次赴美。1873年春，容闳因谋输入五十尊新式军械。曾归国一月，后被李鸿章派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之情形，容闳深为祖国同胞被骗异国受凌辱，曾大声疾呼禁止华工出洋。旋回美主持留学事务所工作，此为容闳第四次去美国。1857年秋，作为监督容闳带领最后一批留学生赴美，不久清政府任命容闳为驻美全权副公使；1979年调旧金山总领事馆以原衔当译员；1881年公使任满，次年因愤李鸿章执行投降路线遣返留学生而回国。

容闳在美娶一美国女子为妻，生二子：长觐彤，次觐槐。1898年美国国务卿雪曼并不承认其为美国公民。1883年其妻患肾炎，容闳赴美省亲。是为第六次赴美。1886年其妻病故。葬于哈佛城西带山公墓。容闳后未续弦至寿终。

1894年冬，中日战争爆发，容闳出于救国之心，曾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购买新式武器抵抗日寇进攻，张之洞允其所请，欲派容闳去伦敦贷款，但遭到主张签订和约的李鸿章的反对未果，容闳愤而归美，是为第七次赴美。张之洞召容闳归国，1895年夏容闳往南京见到张之洞，张之洞派容闳为挂名的江南交涉委员，容闳因看不惯官场钩心斗角的种种黑幕毅然辞

职。1888年起，当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政变后，因为出于对维新这一改良主义“变法”，容闳便逃入上海租界。后在上海组织“中国强学会”，被选为会长。



容闳墓——位于美国康斯维辛州哈德福市西带山公墓

1899年迁香港二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又归美，是为第八次赴美。1901春，容闳去台湾游历，时台湾已在日本统治下，清政府以其同情政变，曾通过日本驻台湾总督欲加追捕，但由于日本总督的保护，容闳得走香港，又旋转去美国，是为第九次即最后一次赴美，从此即住在康涅狄格州哈佛市过着隐居生活。1904年，维新政变首领梁启超赴美曾拜访容闳，当时容闳已七十六高龄，但“矍铄犹者”，胸膛里仍然跳动着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以长者身份，条理秩然地鼓励梁启超仍然要计“策国家之将来”，梁启超对此既感动又钦佩！交谈后容闳引导他游览了哈佛大学。1909年，容闳口述用英语写成《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即现译的《西学东渐记》）一书在纽约出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自传体著作。此书提供了容闳个人做为鸦片战争后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明最早的中国学者这一波奔地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一生；而且也是一本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和美国及其交流的一个侧面的生动记录。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人民怀念

1912年容闳已是八十三岁老人，严重疾病使这位学者无法再为祖国分担任何忧虑了，这时国内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叛变，4月初孙中山被迫宣布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实际上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怀念为中华民国诞生奔波出力的战友，4月20日曾寄了一张照片给容闳，可惜容闳已危在旦夕，而次日即4月21日便在其沙京街284号寓所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死后与其妻合葬于西带山公墓内。

容闳出身贫寒，无论求学或就业，在生活上都很艰苦朴素。经济地位养成了他廉洁自重，关怀民瘼，他的傲然清高的性格，他蔑视官场中钩心斗角的黑幕并耻于为伍。生活在异国资产阶级社会却出污泥而不染，一心念着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振兴中华是难能可贵的。在他忙碌奔波的一生中，热情创办近代工业，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二是认真主持派遣留美学生，为振兴中华造就人才；三是注意国际交往，特别是开展中美文化学术交流上作出贡献，这些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容闳做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实践者，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创办近代留学事业的先声，理应受到赞扬，但是容闳从少年时代起即接受了整套的资产阶级教育，造成了他必然产生的阶级偏见，时代赋予了他改良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因而他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相异却大于共同甚至保有距离，容闳对太平天国由同情到不信任到攻击发展到对清王朝不满到跻身其间为之唱歌，典型地深刻地反映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上的两重性，

这是不奇怪的。

纵览容闳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不少好事，这是他的主流和功绩，他不仅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美国侨胞中他的形象也是根植在人心中，纽约唐人街曾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容闳小学”，就是他的一块海外丰碑。我以为不必苛求前人，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评说他的功过，给予他在近代史上应有的地位是应该的。容闳的见解和追求的目的何况对于今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而又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容闳是值得中国人民怀念的。

南京历史学会年会论文，1982年11月